

# 上海“孤岛”时期的个人记忆

编者按:自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结束后,上海市区沦陷。此时由于日本尚未准备好与英、法、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开战,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得以孤立于日占区的包围之中,形似“孤岛”,因而得名。

陈存仁(1908-1990),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。《抗战时代生活史》是陈存仁撰写的回忆录,书中描写了上海沦陷后,作者目睹的日军残暴行径以及民众的生活经历。

## 军队撤退 民气消沉

国民党军队撤离淞沪后,租界里就不再听到炮声枪声,本来慷慨激昂的民气,也突然之间消沉了下去。

这时候,上海市民对自己今后的命运作出许多打算,有各种各样的想法:大部分人根据上海历次遭受战争摧残的经验,认为租界是安乐土,“一动不如一静”;小部分人认为租界虽能相安一时,但是一旦日军不顾一切地闯到租界中胡作非为,也是防不胜防的,所以无数与党、政、军有关的人都不声不响地溜走了。

从租界到国民党军队的后方,最主要的通道是由上海到杭州。凡是没钱而又怕战祸波及自身的,都向浙江方面逃,逃出去的人数前前后后有二三十万。

那时,租界黄浦江中还有几艘英商的轮船定期来往,有钱又有办法的人都搭乘这些船只逃到香港,但人数有限,且多是工商界人士。

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曾开出一张名单,凡是与政治有关的人

物,每人分送所需要的轮船船票,要他们离开上海再坐飞机到后方,免得将来受日本人的利用。据说这张名单一共有400多人。

军界中人,凡是退休在租界里做寓公的老军人,亦由当局分别致送路费,要他们各奔前程。

一般与党、政、军无关的市民绝大多数还是留在上海,许多人认为租界的防范还是可靠的,而且既与党、政、军无关,更没有逃难的必要。何况久居上海的人有一种心理:“出门一里,不如家里。”就在这种心理之下,上海租界中还是有约400万的人口。

## 群丑蠢动 袍笏登场

日本人在“八一三”战事爆发之前就收买了许多汉奸,从事破坏活动。初期被吸收去的人很少有知识分子或知名之士,商人不肯为虎作伥,干这些勾当的只是一批地痞流氓。

日军占领了上海东郊各乡镇各县后,所到之处都出现了“地方维持会”。这些组织起不了大作用,只能欺压同胞。等到“接收”了整个浦东之后,日军就想到要组织一个“上海市政府”,同时还组织了一个类似党部的群众机构,定名为“新民会”。会员多数有手枪,所以最初的一个时期,都是“新民会”的世界。

后来,日本人给“上海市政府”定了一个新名称,叫做“大道市政府”。这“大道”两字,是根据《礼记·礼运篇》之“大道之行也,天下为公”而来的。就字面来看,他们认为可以博取中国大部分老百姓的拥护,但是一经发表,中国

人都笑起来,因为“大道”两字的读音,同于“大盗”,认为“大道市政府”就是许多大盗组织的市政府。

“大道市政府市长”的人选,完全由日本人支配,选了一个叫苏锡文的当“市长”,袍笏登场,可是这个“市长”大家都不知道他的来历。到了后来才知道苏锡文是一个台湾人,因为他肯听话,所以被看中了,当上“大道市政府”的第一任“市长”。

## 人口突增 空屋皆满

随着战事逐渐扩大,住在战区的老百姓纷纷向租界逃来,不仅是上海市郊的人,连苏州、无锡、镇江、南京的人也都避难到上海,于是上海租界的人口突然间直线上升。

从前富有的人从事置业,新屋造成后,租得出与租不出是一个大问题,选择租客又是一个大问题。我(本文作者陈存仁)清清楚楚地记得,在战前空屋之多,不可胜数。举个例子来说,我的诊所先是在南京路上先施公司斜对面的一座新楼中。这座新楼大约有写字间300间,租出只有20多间。因为四周空屋太多,我觉得冷清清的,很孤寂。恰好新新公司对面新建了一个慈安里,前面是新新公司,后面是新光大戏院,我觉得地点不错,就搬了过去。我住第一弄第一家,那时人口少而房租贵,所以前前后后都是空屋。

“八一三”战事一起,不过三天时间,整条慈安里住得满坑满谷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只宜于作诊所不宜兼作住家,就到法租界亨利路(今新乐路)永

利坊租了一座三层楼的新住宅。那时永利坊还有空屋200多间,但是因为房租太贵,一般居民都望而止步。谁知道战事一紧张,不过20天的时间,全部租了出去。老牌电影皇后胡蝶,由虹口北四川路余庆里逃入租界,就住在我的贴邻,可见得那时房屋的紧张程度已达巅峰。

## 家家储粮 米商发财

战事离上海越来越远,人们对于抗战的形势也越来越揪心,看着严峻的情势一天一天地迫近南京,大家就想到这一次的战争可能会拖长下去。

大家想到,苦难的时期来日方长,不能不有所准备。上海租界成为孤岛,人口一天天增加,大家怕人口一多,米粮会断绝。因为上海人吃的米一半是靠常熟、太仓运来的,一半是外洋运来的暹罗(泰国旧称)米。而常熟、太仓的米不能储存太久,唯有暹罗米经过机器焙干,可以长期保存,于是大家就抢购暹罗米,我也将每天的收入陆续用来收购一些,暹罗米堆满了一间小屋。

不承想,当时上海的主要粮食及副食品始终供应如常,这也要得益于许多跑单帮(从事异地贩运的小本生意人)的小商人。他们在四乡搜购米粮杂物,虽说他们都发了财,可是对一般市民来说也是好事。只是跑单帮的人喜欢携带轻便的物品,而贩米的人因为米重得厉害最是辛苦,但是获利也相当丰厚。

据《抗战时代生活史》陈存仁/著

## “大清制造”为何大衰退

清朝末年以前,“中国制造”在世界上首屈一指,曾引领世界数百年。然而,随着外国侵略和大清王朝坍塌,“中国制造”也一度沉寂。

与大多数后人的想法截然不同,即便是两次鸦片战争,也没有能够击垮中国商人在诸如茶叶、丝绸等大宗商品上的定价权。根本原因十分简单:中国的茶叶、丝绸是西方的生活必需品,其需求相当刚性,是典型的卖方市场;而西方的商品,主要是毛皮、钟表等奢侈品,并非中国的必需品,其需求弹性很大,是典型的买方市场。鸦片战争之后,“行商”制度被取消,但是,一个名为“买办”的群体,取代了“行商”的地位,它虽然远比“行商”松散,缺乏公权力的保驾护航,但也因此获得了更为坚韧的生命力。中国内地相当原始而复杂的商业环境、强大而顽固的“行会”,以及极度匮乏“国际惯例”的金融体系与法制体系,令外商望而生畏。种种制约之下,外商们只能雇请“买办”深入内地,这种被称为“内地采购制度”的体系,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,成为中国外贸的主流模式。

导致中国定价权丧失的,是中国商人自身。鸦片战争之前,中英双方就围绕茶叶质量问题发生多次贸易冲突,这一方面因为部分中国商人以次充好,另一方面亦是英国人通过压低茶叶等级,试图对华商的

定价权发起挑战。1819年11月,英国人对23.1万箱茶叶进行质检,退回了其中的7.6万箱,高达32.9%。而在所接受的15.5万箱中,只有2.3万箱被列为“普通上至仅达中等”,不到10%;其余都是“普通上”或者“勉强达到普通上”。“大清制造”的质量问题,一直是外贸冲突的焦点。1872年,英国《整治假货法案》经修订后实施,对食品安全实行更严格标准,中国茶叶的质量问题是其中的重点之一。

质量之外,交通与通讯革命带来的新常态,也令大清商人无法适应,加剧了定价权的流失。1869年,苏伊士运河开通,并且规定只准蒸汽轮船通行。大量的蒸汽轮船迅速地取代飞剪船,投入东西方的航运。在中国出口额中占了70%~80%比重的英国,从伦敦直航上海的航程由120天以上缩短到55~60天。中国茶叶经由蒸汽轮的快速运送,更能保鲜,因此伦敦市场已不再需要维持6~12个月的茶叶库存,茶叶的国际需求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。

导致中国对大宗外贸商品失去定价权的,不仅是军事上的失败和政治上的腐败,更是技术性的产能过剩、金融落后、质量低劣。更为严峻的是,当外交军事的惨败推动大清国财政成为“赔款财政”时,丧失定价权所带来的经济衰退,既影响了经济层面的造血功能,更在政治层面上有着致命的伤害。

据《老年生活报》

讲文明树新风 公益广告

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

# 勤劳人 吉祥人



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陕西卢基 王乃亮作